

论雷努的边区小说创作

姜永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地语文学界出现了“边区文学”的风潮。在这一文学派别当中,小说是最主要的创作样式。边区小说可以说是印地语农村题材小说的一种类型。印地语小说界以农村为题材创作小说的传统早在边区小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有不少印地语作家创作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普列姆昌德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创作过不少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冬夜》、《半斤小麦》、《地主的水井》等。《博爱新村》是他的第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他的《戈丹》更是被称为描写“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①。独立运动期间,圣雄甘地等领导人提出了“回到农村去”的口号,许多作家的目光开始从城市逐渐转向农村。独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长久以来封闭落后的印度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这给农村地区尤其是长期以来处在很多人视线之外的广大边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另外,随着城市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物价上涨,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也日益增多,在种种压力下,不少作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落后的农村生活。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边区文学的潮流也并不奇怪。小说家们选择落后的边区作为小说的发生地,描绘了居住在那里的被忽视的人们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内心里朦胧的希望以及由于贫穷和愚昧而产生的各种丑陋现象,同时也表现了这些边区居民中存在的人性的美。以雷努、那加尔久那为代表的一些边区小说家创作了很多作品,如雷努的《肮脏的裙裾》、《荒土地的故事》以及那加尔久那的《伯尔金马》等。

雷努的边区小说与印地语界以往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大不相同。印地语界关于“边区小说”的提法,是在雷努的第一部小说《肮脏的裙裾》发表之后开始提出的。而印度边区小说创作的热潮,也是

在此后形成的。印地语界对究竟哪一部小说才是“边区小说”的开始也有过不少争论。有的人认为是《拉姆拉尔》(1914),也有的人认为是希沃布金·萨哈耶的《农村世界》(1926),还有的人认为是尼拉腊的《牧羊人比勒苏尔》(1944)。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雷努的《肮脏的裙裾》才是印地语的第一部边区小说。总体来说,雷努的边区小说可以列入现实主义小说之中,他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由于他在创作风格和技巧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使得他所创作的小说又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叙述方法、情节设置上,还是在人物刻画、语言风格上。“雷努的小说创作在印地语小说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其意义都是重大的。雷努通过长篇小说《肮脏的裙裾》奠定了边区小说的基础,使边区小说成为印地语小说领域中新的潮流和新的转折点……”^②因此他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在印地语文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边区小说也作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风靡于五六十年代的印地语文坛。因此,对这一文学流派的开创者雷努的边区小说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笔者将从雷努的边区小说创作情况、作品中所展现的边区风貌、叙事风格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 雷努的生平及边区小说创作概况

雷努,全名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是印度现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博士生

① 刘安武著:《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

② 转引自薛克翘:《印地语小说〈肮脏的裙裾〉及其民俗学价值》《南亚东南亚评论》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代印地语作家。他于1921年3月4日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普尔尼亚县的奥拉希兴格那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中虽有些土地,但并不富裕。由于是长子,父亲送他上了学。他曾先后在比哈尔邦的法尔比斯甘吉、尼泊尔的维拉特城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40年进入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徒大学学习。与其他许多同时代的印度作家一样,雷努也全心全意地参加了印度争取自治的斗争。1942年,他放弃学业参加了著名的“退出印度运动”并因此被捕入狱,1944年获释。1950年,雷努参加了尼泊尔人民摆脱国王暴政,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952年至1953年间,由于受到肺病的侵扰,他主要居住在比哈尔休养。1954年,他又积极参加了由杰·伯勒卡什领导的全国性运动。此后一直居住在比哈尔邦从事文学写作。20世纪70年代初,雷努重新进入政治舞台,并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比哈尔邦立法会议的选举,但未获成功。1974年,为抗议巴特那警察殴打人民党积极分子的暴行,雷努将政府授予他的文学奖退回,并拒绝领取政府津贴。1975年参加了反对紧急状态的抗议活动,再次被捕入狱。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于1977年4月12日病逝,年仅56岁。

与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样,雷努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很积极。雷努大约从15岁就开始尝试写作短篇小说和诗歌,在所就读的学校里总是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是雷努真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还是在194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榕树老爹》、《角斗士的鼓》以及报告文学《肆虐的科西河》之后。此后他一直不间断地从事文学创作。1954年雷努的第一部长篇边区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肮脏的裙裾》发表,在印地语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1955年,《肮脏的裙裾》被评为该年度最佳小说,获总统奖。1957年,雷努发表了第二部长篇边区小说《荒土地的故事》。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如1962年的《长期苦修》、1965年的《游行》、1971年的《多少十字路口》^①等。另外,雷努还出版了几部短篇小说集:《民歌》(1959)、《初夜馨香》^②(1967)、《食火者》(1973)以及《我最喜爱的短篇小说》(1975)等。雷努去世后,他的一些遗作相继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巴尔杜先生之路》(1979);短篇小说集《五月正午的阳光》、《好人》;

报告文学《债水财水》(1977)、《尼泊尔革命故事》(1977)以及回忆录《杜勒西树的芳香》等。1995年,印度国莲出版社出版了由帕勒德·雅雅沃尔主编的《雷努作品集》共五卷,其中收录了雷努所有发表的作品以及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二 雷努小说中展现的边区风貌

雷努小说中的取材具有典型的地域性。所谓“边区小说”,就是要表现某个特定边区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全景全貌。而雷努的边区小说中则展现了比哈尔邦东北部普尔尼亚边区的自然风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等。就像雷努在《肮脏的裙裾》前言中所说的,“故事的发生地是普尔尼亚。普尔尼亚是比哈尔邦的一个地区。它的一面是尼泊尔,另一面是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当我们在南边划出桑塔尔族地区,在西边划出米提拉地区的界线时,这些不同的分界线便勾勒出了它的完整轮廓。”^③这一完整轮廓内的广大边区便是雷努小说所要表现的对象。例如《肮脏的裙裾》讲述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普尔那尼亚地区的一个小村玛丽村所发生的故事。《荒土地的故事》讲述的是1955—1956年间普尔尼亚地区伯朗布尔村的故事。在这两部小说中雷努描绘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全貌。由于长期生活在比哈尔邦,雷努对边区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他看到了边区的土地、草木、河湖、农田以及居民最美丽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由贫穷和愚昧导致的迷信、偏私、堕落。正如他在《肮脏的裙裾》的前言中所说的:“这里面有鲜花也有荆棘,有红粉也有尘埃,有芬芳也有污秽,有美丽也有丑恶……我不能回避其中的任何一个。”^④

雷努的小说中不仅展现了边区的美景和众多的人物,同样也展现了边区特殊的社会风俗习惯。雷努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阶层的风俗习惯。《肮脏的裙裾》就展现了村里的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

① 又译《歧路知多少》。

② 又译《初尝温馨》。

③ 《肮脏的裙裾》,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二卷第22页,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

④ 《肮脏的裙裾》,见《雷努作品集》第二卷第22页。

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居住在村外的桑塔尔人的独特风俗习惯等。低等种姓的人们在雨季来临之前举行的祈雨仪式就非常独特。同样,高等种姓也有自己的风俗和传统。村里的寺院有自己独特的环境、风俗和制度。例如,寺院里有豢养女奴的传统,《游行》里迁移来的孟加拉人也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雷努通过对这些风俗习惯的描写,不仅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边区色彩,也表现了边民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雷努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节日和歌舞的场面。《肮脏的裙裾》中表现了洒红节和独立节的场面。在节日里人们经常自编歌舞,有时还请戏班子唱戏,用这样的方式尽情地享受节日带给他们的快乐。例如,加利杰兰一伙人所表演的滑稽诗就不仅映衬了洒红节的欢乐场面,也揭露了许多社会不公现象。《荒土地的故事》中描绘了在吉登组织的伯朗布尔村恢复民间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村子里举行的跳绳会、民间故事朗诵会以及赛歌会等场面。这些描写都使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边区文化的独特魅力。

总的来说,雷努在他的边区小说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普尔尼亚边区的宗教信仰状况、节日庆祝活动和民间文艺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等,他的作品被许多人认为是“比哈尔邦东北部农村民俗文化的教科书”。

三 雷努边区小说的叙事风格

雷努在边区小说中所使用的叙述视角与叙事方式非常独特,这也是边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雷努在小说中既不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也不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而是喜欢把事件、人物和故事片断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事件、人物和片断相互交织着向前发展,形成复杂的网状结构。在小说中,雷努既不对人物作特别的介绍,也不对事件做特别的叙述,他似乎是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或是场景当中。有时他像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有时又好像是事件中的一分子。他很少对事件或者人物发表看法,而是让事件随着自己的节奏发展,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在雷努的笔下,人物和事件似乎不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的,只是由作者用笔墨将他们

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已。

传统风格的小说家们在小说的开始习惯于对人物和背景做一定篇幅的介绍,然后让事件或故事情节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雷努的写作方法与此正好相反。他把人物和事件一股脑地摆在读者面前,而这些人物或事件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再出现。人物和事件之间是流动的关系,一个人物或事件出现之后可能很快就消失或退场了,紧接着与之相关或是不相关的某个人物或是事件又登场了。例如《肮脏的裙裾》第一章,为了在玛丽村建造一个防疫站,地区来了几个人。按照一般的写作方法,可以让情节这样发展:先介绍来丈量村里土地的人物情况,在这些人来之前介绍村子的情况,或者说一下这个村子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然后在介绍情况的同时把要在村里建立防疫站的消息通知大家。然而雷努在小说中并没有使用这样的叙述方式,而是借“地区来人”这件事情创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场面,把边区小村生活中深层次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来了。作者没有直接说明地区来人的来意,而是在村子里散布了这样的谣言——“来了几个大兵把杰特鲁抓走了,还把罗宾家井上的铁桶也解下来拿走了。”^①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谣言呢?因为玛丽村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村子,他们分不清军队士兵和地区官员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这个村子在1942年的兵变时被波及,因此只要是来了政府官员都会让人胆颤心惊。就像一粒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一样,作者用一个小小的谣言在平静的小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次事件中,村子里许多阶层的人都露了面,而且展现了各自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只是让各种人物与自己周围的人物一起自由地表演。听到谣言之后,比兰吉·达斯鼓起勇气走了出来。出了院门之后四处望望,朝着东家巷的方向跑去。东家巷的税官维什沃那特·普拉萨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吃了一惊——“但是铁桶是哪儿来的呢?准是偷的!这些混蛋们一定会再偷东西,给整个村子抹黑。”^②税官先生余惊未了,却又转念想到罗宾家水桶的问

① 《肮脏的裙裾》见《雷努作品选》第二卷第23页。

② 《肮脏的裙裾》见《雷努作品选》第二卷第23页。

题,一方面交待了罗宾家的地位,同时也反把上等阶层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消息从东家巷传到了拉吉普特巷——“加耶斯特巷的维什沃那特和达达马巷的比兰吉被抓走了。地主拉姆吉尔巴尔·辛赫说——这一次税官可有好看的了。总是克扣土地税。这一次也让他尝尝班房的滋味”。^①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辛赫对税官的嫉妒态度展现得活灵活现。“亚德沃巷的人们听到消息之后就把那个绰号‘牺牲品的巴尔代沃绑着来了。别让他跑了,绑紧点!早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让整个村子都遭殃的。”^②就这样,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谣言作为线索就把小说中的环境、人物及其思想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在这一章里,要建立防疫站的消息一方面使读者认识了巴尔代沃、税官维什沃那特、辛赫、拉姆凯拉文·亚德沃等主要人物,也使读者对他们在村子里面的地位和关系有了初步了解。维什沃那特即使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也不放过剥削他人的机会。他把作为礼物送给长官们的上等米和小羊所用的花费全算在了下层人民头上。巴尔代沃在被长官认出来之后他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了出来,看到长官们态度的变化,村子里的人也纷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从上文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以一个全知的故事解说者的身份向读者叙述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所有情况,而是像一个编剧一样把人物和事件放在舞台上,让人物自己表演,让事件自己发展。虽然作者在这里未作任何评论,但是读者已经可以从人物的言行中对其性格有了初步了解。这样的例子在雷努的边区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是从《肮脏的裙裾》第一章里我们对雷努小说的叙事风格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雷努边区小说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整个“边区”替代主要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通过对整个边区进行全方位的刻画,边区的全景生活替代了人物和事件在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无论是在《肮脏的裙裾》还是在《荒土地的故事》中,都找不到一个特别明晰的主干故事,而是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整部小说不是围绕着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来展开描写,而是由与多个人物相关的多个小故事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即使如此,这些内容在小说中的篇幅也不是很大。作者的目

是对整个边区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刻画。这两部小说中,涉及的人物都有一两百之多,即使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也有十儿人。小说的故事情节看起来分散而零碎,让读者很难把握小说的主线。雷努的边区小说读起来不如传统小说那样故事性强,也许会使读者迷惑。但是这也是边区小说所以能自成一派的主要原因。作为边区小说的代表作家,雷努在创作的时候试图捕捉和展现的是整个边区在某一特定时间里的整个生活全景,因此凡是构成这一全景生活的元素,雷努都想把它在小说中展现出来。这一点在以主要人物为基础构造情节的小说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 雷努边区小说的语言特色

雷努的小说大多是使用印地语的迈提里方言写成的,使用方言可以说是雷努对印地语小说语言表述方式的扩展。虽然方言写作会给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带来很多困难,但我们从雷努的小说中读出了浓郁的边区特色。

小说语言的天然性成为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每个人物口中说出的语言可以展现这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小说家们在创作时往往注意使用适合人物的语言。雷努小说中的会话就非常具有特色。雷努对小说中人物特色语言的要求很严谨,同时也很注意对边区语言的使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能够使读者准确地了解这个人物。人物的个性、内涵以及社会地位全都能够从语言中体现出来。《荒土地的故事》中有些地方有不少英语对白,是纯正的英语语句。同样,尼泊尔的英雄巴尔伯迪亚的语言也充分展现了尼泊尔语的特色。

雷努喜欢根据人物和环境的不同使用多种语言和说话技巧。他是根据人物的心理和所处的环境来安排会话的简与繁、长与短、快与慢以及呆板与幽默的。比如在《肮脏的裙裾》中,巴尔代沃由于所受教育不多,说话的时候语言总是很简单,所以雷努在处理他的讲话方式时,句子组织和词汇安排中总是体现出简练。而焦德克大叔是婆罗门,他

① 同上书,第24页。

② 《肮脏的裙裾》见《雷努作品选》第二卷第278页。

说话的方式就繁琐得多。他从来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说话时时常带着讽刺和嘲弄。低等种姓的女人们语言往往比较粗鲁,话语中常常带有骂人的字眼。加利杰兰等社会党领导者的语言都很直接,而且言语中蕴含着力量。《荒土地的故事》中鲁多等党派领导者的语言中含有一些伪善的成分。另外,这些小说中也有一些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如拉克西米、医生普勒祥德、伯维德拉、葛玛丽、吉檀德拉、达吉玛妮等,这些人的语言充满了真、善、美的色彩。诸如此类,在雷努的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语言受不同个性的影响有多种形式和色彩。

上文已经说过,雷努在安排人物的时候从来不让某一个人在某一地点停留很长时间,不同的人物来去匆匆,因此表现在语言上,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也不会很多,而且很多人的会话同时进行,有时作者甚至根本不提究竟是谁在说话,读者只有仔细分辨才有可能判断是谁。在这种情况下,人物的对话自然很短小。而这些短小的对话间又相互覆盖,形成了复杂的语言环境。有时甚至看不出有人说话,或者说觉得有人说了什么却不能确定是谁。雷努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群体的会话。例如《肮脏的裙裾》中,警察来抓加利杰兰时村民们的反应和议论:

“快跑,快跑,军队……军队来了!”

“啊,天哪,不是包红头巾的警察,是廓尔喀士兵!听说他们比白人士兵还厉害,打起人来往死里打呢。……”

“哎,什么事?……是谁在造谣?”

“不是造谣,是达达马巷的伯布阿跑来说的。

不信你问他!”

“唉呀,听见了吗?汽车声!”

“对,朝东家巷附近开过来了!”

“快跑!红色的摩托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

“往哪儿跑呢,车都已经来了!”^①

上面的这段话,就是典型的雷努风格的群体会话。虽然读者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人在说话,也不知道是谁在对谁说,但是从对话当中我们却能体会人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的好奇、惊讶以及恐惧的复杂心理。

雷努的小说语言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诙谐幽默的色彩,有时还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例如《肮脏的裙裾》中,在一次社会党的集会上,有人在台上讲话:“……我们的红旗是工农的鲜血染成的!”扶旗的村民巴德尔达斯听了此话大吃一惊。巴德尔达斯是毗湿奴派信徒,平时一点荤腥也不碰。他心想:“红旗是人血染成的?呸!加利杰兰毁了我的清白!旗杆在我手里?……他一下子就把旗子摔在地上。天哪!人血染成的红旗!”这一小段心理活动的描写令人啼笑皆非。通过这样的描写,作者一下子就把农民群众对政治宣传的无知体现出来了,同时也暗示了农村中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盲目性。

雷努是一个语言大师,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游刃有余。他对印地语小说语言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因此,雷努被称为印地语边区小说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

① 雷努著《肮脏的裙裾》,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选》第二卷第 112页,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